



诸城名人馆内展示着王氏家族走出来的杰出人物。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摄

诸城王氏的乡绅记忆



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实习生 岳倩南

“从为本书写作进行的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到本书写作的整个过程,我感受最深、最被震撼的是诸城王氏乡绅集团对地方社会政治、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潍坊学院王宪明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虽然经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洪流,诸城王氏对地方社会某些影响,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在王宪明看来,这首先表现在教育方面。明清时代,诸城王氏培养了诸城数量最庞大的科举、仕宦群体。与民国相始终的相州王氏私立小学,在诸城历次会考中屡屡夺魁,人才辈出。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以相州王氏为主导培育起来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仍然深入人心。“我初中在相州中学毕业,师长中有不少相州王氏家族成员,1981年参加中考,最后统计结果显示,诸城总成绩前20名,地处偏僻的相州中学就有9人。”王宪明说自己也是相州一带重教传统的受益者。

“光相州王氏我知道的从事教师行业都不下百人。”相州王氏十九世王松魁颇为自豪地说,过去家族对教育重视仍然持续至今,“百年树人,教育应该走在任何前面。”

一直以来,王氏家族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关心宗族故里。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年,诸城连年灾荒,王沛擅在广西遥控指挥亲族赈灾,他给王沛恂、王沛隐等都写信建议,要求于城内施粥,并用“不有民,何有国?”来劝导家族中人救急灾民。

“诸城王氏很多人在朝则为官,居乡则为绅。”王宪明认

为,乡绅对政治管理的非制度性参与,可能影响行政效率,但却可以大大节约行政成本。明清朝廷命官,至县级为止。知县总揽大权,下设县丞、典史、主簿、训导等各一、二员,机构并不复杂。

乾隆《诸城县志》卷九《田赋考》介绍“官僚役食”时写道,“共计一千八百二两七钱一厘四毫”。“白银价格我们一两折合三百元人民币,以此计算,清代全盛时期诸城全部管理成本,不过五十万元左右。管理队伍小,成本低,人民负担自然减轻。”王宪明说。

何以会有如此小的管理成本,则在于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县衙以下,并非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在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其一,是隶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其中在编吃财政饭的不过数十人。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他们不拿俸禄,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其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一般每县数百名上千名不等。“像诸城这样的科举、仕宦大县,清朝中后期,乡绅数量要超过千人。”王宪明说。

乡绅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在于族内,还可以制约到地方行政权力的施展。在官绅合作管理的模式下,维持社会稳定实际上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明清时代诸城的“匪患”很少。而在几次捻军过境,抢掠诸城

时,诸城王氏都积极抗捻保家,其间,山东巡抚甚至允许王氏以军法治乡兵,足见对其的信任。

乡绅阶层本来品流不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风采和局限,像《白鹿原》中关中大儒朱老先生那样的人祥瑞毕竟是极少数,农村民主自治,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绝对会和诗人描写的那样美妙绚丽。但古代官绅合作管理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王宪明希望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的变化。

但无论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如何变化,总带有当地地方大家族的痕迹,有时这座城已经与大家族融为一体,人们因大家族记着这个城,或因城记着大家族。大家族过去的光彩与风气总能从现在这座城寻找一些痕迹。

走进诸城名人馆,一进门则是高大的舜雕像,就在二楼展示着不下5位诸城王氏的资料或者文物,王松魁说,只要市民浏览,他们就能感受到王氏曾经在诸城的影响,曾经为共和梦而奋斗,曾经为新中国建立努力,还有过去他们助学助人的故事,浏览后市民总会在心里留点什么,“哪怕再少,也有痕迹。”

也许王松魁的描述正如同记者所遇到的,当记者与当地司机、酒店服务员聊起来时,他们都知道诸城王氏过去对诸城的影响,“大家族”、“重视教育”、“帮扶乡里”,他们也许不知道这种影响也波及了他们。



诸城相州镇街景。(资料片)

家族解码

与多家八旗联姻

清代“旗民不结亲”、“满汉不通婚”虽无法定明文,但满汉不通婚,几乎是约定俗成。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持血统,也限制满汉通婚。直到1901年慈禧废除旧例。但在这之前,清朝前期、中期,诸城王氏就频频与旗人互有婚嫁。

比如与旗人联姻的是王氏十一世的王垂绮和王增贤各娶了两位八旗闺秀为妻。八旗子弟大多奢华,当以处事低调著称的“老实”王家与几个八旗家族联姻时,其家风也出现豪奢的现象。首先是大兴土木,相州镇及王沛擅别墅所在的道明村,楼堂栉比,至今民间尚有“远看相州像诸城,近看道明似北京”之说。由于建造违制,被人弹劾,幸亏朝中故旧暗通消息,在调查人员赶来前拆除。

研究者说

诸城王氏：与时俱进人才辈出



王宪明 潍坊学院

明清时期,诸城王氏(主要指诸城相州王氏)造就了诸城最大的科举、仕宦群体,辛亥以来军政文教界闻人,仍然为诸城乃至山东各大家族之首。这个家族最明显的特点是顺应世变,与时俱进。

明清科举考试,诸城王氏士子于儒家《五经》,多专攻《周易》。而《易》学自先秦两汉之际,便为诸城显学。现在通行的《易经》文本,由齐人田何手定。而田何之《易》,受自战国时孙虞(字子乘),传于汉初王同(字子中),皆东武(即今诸城)人。据诸城媳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宋代诸城赵氏也家传《易》学。《易》学的基本精神就是与时俱进,诸城王氏家族善于顺应世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家族的整体成功转型,证明这个家族,不愧《易》学之乡的《易》学世家。

诸城王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勤俭敛抑,急公好义。《清史稿》称诸城王氏为“老实王家”。“老实”者,不逞势,不炫富,诚信待人也。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是说富贵子弟,易于骄奢淫逸,忽焉衰落。相州王氏持盈保泰四百余年,家声不坠,得益于“老实”二字,有《周易》“劳谦”之吉而无“鸣豫”之凶。“老实”克制私欲,自然扩大公心。在诸城历代县志中,赈灾行善,总少不了王氏身影。清咸丰年间捻军两次过境,王云湘组织团练自保,山东巡抚重其才,“给札许以军法治乡兵”,王云湘弃置不用,宁以恩信结人,卒得乡党死力,保全桑梓。

诸城王氏第三大特点是弓冶相承,集群效应。家族重视教育,资源共享,后先继武,言传心授,人才出现明显的集群特点。且不说明清二十一位进士、六翰林、四解元、两左都御史、十三知府、三十一知县,只看近现代以王锡荣、王绪祖、王希祖、王维朴为代表的金石家群体,王溥长、王作楨、王熙麟为代表的古琴家群体,王翔千、王乐平、王叔铭、王深林为代表的军政界要人,王统照、王意坚、王希坚、王愿坚代表的作家群体,也已令人赞叹。单看一个人,其成就也许不特别引人注目,但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就和影响则令人惊叹。

诸城古琴奠基者

诸城王氏王溥长是诸城古琴奠基者之一,关于他的师承无可靠资料查询。但他带动族中很多人学习古琴,并形成古琴世家。家族中王作楨是承先启后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奖掖诱后进学琴,创立诸城派第一个琴社“东武学堂”免费传艺。经过辗转相传,后来其门人弟子已发展到上百人。其中成就、名声最著者为王熙麟、王露。

在清末民初诸城琴人中,王宾鲁是最有艺术家气质,同时个性也比较矛盾的一个。他尊崇大雅元音,而不免流连绮丽小调;他告诫弟子不要贪杯,自己却唯酒无量,并有可能死于酒精中毒。他早年还进青楼教琴,不过晚年执教南京,没有见到他涉足秦淮画舫的记载,这既是他勇于改过的表现,王作楨、王露等师友的规训,可能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王作楨有时还亲自选材监制古琴。其最得意之作是一张仲尼式百衲琴,龙池内有墨题字:“诸邑东南有庐山焉,上有枯桐一株,同治秋被雷击碎,中有大榻一只约尺许,余于灰烬中择取佳木一片,诸多补缀,始成此琴,爰名‘百衲’。故志之。”

热衷金石学

诸城王氏有王锡荣、王绪祖、王维朴父子祖孙三代金石专家之外,一般的金石爱好者,收藏者还有很多——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家族文化环境,才产生了王锡荣等名闻天下的金石名家。

王维朴还对金石学的家学进行总结,《诸城王氏金石丛书提要》。在王维朴留学美国之前,曾在天津出售了一批家藏文物——主要是刻石,其中有的藏品甚至辗转流出海外。如后秦《辽东太守吕完墓表》,为王绪祖在天津所购端方藏品,被王维朴出售后,辗转为日本江藤氏所藏。北魏《高洛周七十八人造像记》,亦为王绪祖所购端方遗物,今藏法国巴黎博物馆。对与王维朴出售文物,收藏界颇有微词。王维朴对此做过解释。

王维朴在乱世出售文物,化整为零,客观上有利于文物保存,不至于像同乡前辈赵明诚李清照,甲海内之收藏,因流亡而抛弃殆尽,有明哲的一面。至于他说出售文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也不尽然,他出国留学的盘缠,得益于文物出售者也不少。

据《明清诸城王氏家族文化研究》(王宪明 著)

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http://www.qjwb.com.cn/>)齐鲁世家专题页面。